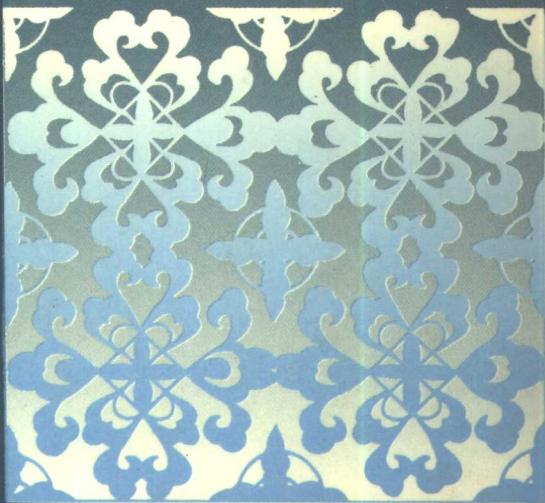


秦汉
文学关系史

云峰 著

新疆人民出版社



I207.912
Y964

云峰
著

蒙汉 文学关系史

新疆人民出版社

第一文学
—历史

蒙汉文学关系史

云 峰 著

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

(乌鲁木齐市解放南路348号 邮政编码830001)

新疆新华书店发行 新疆新华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0.75印张 4插页 250千字

1997年4月第1版 1997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000

ISBN7-228-04053-8/I·1494 定价:15.00元

序

市新

《蒙汉文学关系史》一书是第一部以蒙汉文化交流为背景,用比较文学的方法,系统论述蒙汉文学之间关系的学术专著。

全书分别对元代、清中前期、近代的蒙汉文学关系进行了论述。时间以公元1206年蒙古汗国建立至1911年辛亥革命、清王朝灭亡这700多年为期限,个别也延伸到现代。

本书在于通过评介蒙古族文化之前,蒙古草原上活跃着诸多草原游牧民族及其代表着的草原游牧文明与以中原汉族为代表的农业文明之间的交流、融合,来说明蒙古族以前,蒙古草原与中原内地已有了广泛的接触交流,蒙古族是其继续,为论述蒙汉文学关系提供了一个比较厚实的文化背景。每编前的概说,论述本时期交流概况,后面若干章节,对其中较突出的作家作品进行了系统评论。共评述了数十位蒙汉族作家及数百部作品。

蒙汉文学关系源远流长。自从成吉思汗于公元1206年建立蒙古汗国后,蒙古人就与汉文化发生了接触与交流。到了元世祖忽必烈统一中国,建立元朝后,掀起了第一次蒙汉文化交流的高潮。其间蒙汉文学交流主要是在蒙古族的传统文化及其风俗习惯、歌舞音乐、性格气质对元散曲、戏剧、诗歌繁荣发展的影响,以及蒙古族学者文人直接用汉文进行文学创作。同时,汉族作家也写了不少反

映草原蒙古生活的作品，丰富了中国边塞诗的创作。进入明代，由于明王朝与北元势力形成了割据局面，文学交流因此被阻隔。到了清代归于大一统，蒙汉文学交流又得到发展。其中，清中前期主要是蒙古族汉文文学创作，以及汉族学者对《蒙古秘史》的研究。清后期，即近代时期，是蒙汉文学交流的黄金期。这一时期在蒙汉文学交流的影响下，涌现出了蒙古族文学史上第一部姊妹篇长篇小说《一层楼》、《泣红亭》；蒙古族文论史上第一部较系统的文学理论作品《新译红楼梦回批》；涌现出了大批蒙译汉作品，如《三国演义》、《红楼梦》、《水浒》、《今古奇观》等小说。这些都在本书中得到了很好的评述与反映。其中，本书对蒙古族文化对元曲形成发展的影响及在汉文学影响下出现的第一部蒙古族长篇小说和文论作品的论述颇多新意。

本书的特点是在大文化的背景下论述蒙汉文学之间的关系，也就是说论述文学关系并不仅仅局限于文学，而是在论述文化背景的前提下来论述文学关系，就是对具体作家作品及文学流派品种的论述也力求体现这种思想，使其显得有厚度和力度。作者在搜集大量史料的基础上写出这一部书一定是难能可贵的，但某些有争议的作家和作品，还希望进一步研究和考证。

作者通过本书企望能为中华民族文学是中国各民族共同创造的这一大课题提供一些材料与佐证，从而对研究蒙汉族文学史、祖国各民族关系史以及加强今天的民族团结，增强民族自信心起积极作用。《蒙汉文学关系史》一书开了个好头，希望有更多的人来研究这方面的问题，继承各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繁荣社会主义文化。

前 言

蒙汉文学关系是个比较久远的值得探讨研究的课题。自从成吉思汗于公元1206年建立蒙古汗国后,蒙古人就与汉文化发生了接触与交流。其后,蒙汉文学关系就在蒙汉文化交流这一大背景下进行交流与发展。到了元世祖忽必烈统一全国,建立元朝,蒙古民族入主中原后,掀起了第一次蒙汉文化交流的高潮。蒙汉文学交流也得到了长足的发展。此时期的蒙汉文学交流主要是在蒙古族的传统文化及其风俗习惯、歌舞音乐、性格气质对元曲、诗歌繁荣发展的影响与蒙古族学者文人直接用汉文进行文学创作,以及汉族作家写了不少反映蒙古生活的作品等方面展开。元代中国文学,特别是元曲的繁荣发展受到蒙古族文化的明显影响,蒙古族作者的汉文文学作品也为元代文学史提供了堪称一流的佳品,汉族作家反映蒙古生活的诗作丰富了中国边塞诗创作。进入明代,由于明王朝与北元势力以长城为界形成了割据局面,所以虽然大文化方面有接触,但文学交流却被阻隔了。一直到了清代国家再次归于大一统,蒙汉文学交流才又得到新的发展。其中清中前期主要是蒙古族汉文文学创作及汉族学者对蒙古族史传文学名著《蒙古秘史》的研究等方面。清后期,即近代时期,是蒙汉文学交流的黄金时期。这一时期在蒙汉文学交流的影响下,涌现出了蒙古族文学史上第一部姊妹篇长篇小說《一层楼》、《泣红亭》及其作者尹湛纳希;蒙古族文论史上第一部系统文学理论作品《新译红楼梦回批》及其作者哈斯宝;涌现出了大批汉译蒙作品如《三国演义》、《红楼梦》、《水浒》、

《今古奇观》等小说；蒙古族说唱文艺也大量以汉族文学作品为素材等。这时期比较好地解决了两个民族文学交流为我所用这一课题，并且为现当代的蒙古族文学创作及蒙汉文学交流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

蒙汉文学之间存在着比较密切的关系这已是不可否认的历史事实。本书着重勾画蒙汉文学关系这一历史发展脉络，并介绍其间的著名作家与作品。开头有一段比较长的引言，意在通过评介蒙古族文化之前，蒙古草原上已活跃着的诸多草原游牧民族及其代表着的草原游牧文明与以中原汉族为代表的农业文明之间的冲突、交流、融合，来说明蒙古族以前，蒙古草原与中原内地已有了广泛接触交流，蒙古族是其继续，为论述蒙汉文学交流提供了一个比较厚实的文化背景。接着正文分为三编，分别对元代、清中前期、近代的蒙汉文学关系进行了论述。时间以公元1206年蒙古汗国的建立至1911年辛亥革命清王朝灭亡这700多年为限，个别处也酌情延伸到现代。其中明代由于不便单独分编，故有的划入元或清中前期编。每编前又有一比较长的概说，论述本时期交流概况，后为若干章节，对其中较突出的作家作品进行了系统评论。共评论了数十位蒙汉族作家及数百部作品。以此企望能基本描述出蒙汉文学关系之间的历史概貌，介绍其中的重点作家作品与文学流派样式。

蒙古民族是个比较开放的民族，其文化属草原文化系统，具有开放、吸收、融合、凝聚的特色。如历史上蒙古民族除与汉文化发生接触交流外，还与阿拉伯文化、藏文化发生了广泛接触交流，但这些交流过去研究的是不够的，描述其关系历史就更为少见。本书就是在这种筚路蓝缕的情况下进行的，因此困难比较大，不足之处也是肯定存在的。

本书力图在大文化的背景下论述蒙汉文学之间的关系，也就是说论述文学关系并不仅仅局限于文学，而是在论述文化背景的前提下来论述文学关系，就是对具体作家作品及文学流派品种的

论述也力求体现这种指导思想,使其能显得有厚度与力度。因此企望能为中华民族文学是中国各民族共同创造的这一大课题提供一些材料与佐证,从而对研究蒙汉族文学史、祖国各民族关系史以及加强今天的民族团结,增强民族自信心能尽一点绵薄之力。这也正是作者今后的努力方向,作者企望着今后进一步对蒙古族与阿拉伯民族、藏族、俄罗斯、朝鲜、日本等中外诸民族之间的文学关系以至大文化关系进行研究,所以殷切希望专家学者对本书的不足以至失误之处提出批评指导意见。

著者

1993年12月于北京

引言

欲论述蒙汉两个民族文学之关系，必先明了蒙汉两种不同文化系统的各自特质及其相互间的冲突与相融性，以及这种冲突相融的历史背景。否则就无法对蒙汉文学关系进行深入探讨研究。本书拟在正文展开以前，以“引言”的形式，对蒙汉文学关系的历史背景作一简略的回顾与探讨。

中华民族由祖国各民族组成，中华民族文化亦由祖国各民族共同创造。这其中汉民族文化占据了主导地位，但其他各民族包括蒙古族亦做出了自己的宝贵贡献。

文化学术界一般认为，汉民族创造和代表了农业文明，北方草原游牧民族其中包括蒙古族创造了游牧文明。而从祖国各民族组成中华民族这一概念意义上讲，中华民族从跨入文明门槛起，到西方资本主义殖民者大规模侵入止，就面对着在温暖湿润、江河纵横的自然环境中滋生的农业经济文明与在干燥寒冷的草原大漠中发育起来的游牧经济文明的冲突与整合这样一种文化生态类型。

历史上中国人反复讨论的“华夷之辨”，就是研究这种文化生态差异及其导致的文化冲突与整合。如春秋时的“裔不谋夏，夷不乱华”^①之说，就是把“四裔”、“夷狄”与华夏作为两种不同的文化类型，从地理环境、经济生活、政治制度、社会心理诸方面

^① 《左传·定公十年》。

加以比较的。这“夷狄”很重要的组成部分就是北方草原游牧民族。如大约成书于战国时期的《礼记》曾对“天下”作两级划分，一级是“中国”与“戎夷”之分。“中国”（即指中原）是农业经济的文明之邦，“戎夷”（即指周边少数民族）是采集经济、游牧经济的所谓“野蛮”之邦。二级又将“戎夷”划分为夷、狄、蛮、戎，与“中国”相对应。这种民族划分法在中国历史上有很大的代表性和延续性。如后世学者明清之际的王夫之（1619—1692）还进一步对其展开了论述。他分析二者的文化差异称：“夷狄”处于“射生饮血”^①阶段，其生活方式是“彼自安其逐水草、习射猎、忘君臣、略昏宦。驰突无恒之素”^②。这是对游牧文明的概括；至于中原地区的华夏族则“有城郭之可守，墟市之可利，田土之可耕，赋税之可纳，昏姻仕进之可荣”^③。这又是对农业文明作了概括。当然，到了近代中国人则通过东方农业文明与西方工业文明的对比，从两种文化生态的差异性中，对自己的文化特质进行了重新认识。

农业文明和游牧文明是有其质的差异性的。这种文化差异现象与其自然环境（又称地理环境）、社会经济环境、社会政治环境密切相关。因为这三种环境形成的综合格局，决定了其民族的文化心理诸特征。其中地理环境虽本身不是文化，但它却是文化赖以产生的基石。普列汉诺夫就曾说：“不同类型的社会的主要特征是在地理环境的影响后形成的”^④。

中国农业文明的地理环境主要指今黄河流域及江淮流域地区，游牧文明的地理环境历史上主要是指今东起嫩江流域西至天山，南起长城北至贝加尔湖这一片广大的草原地区。农业文明区地处暖温带和亚热带地区，有江河灌溉的便利，为农作物的生长

① 《诗广传》卷五。

② 《读通鉴论》卷二八。

③ 《读通鉴论》卷二八。

④ 《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卷三，第179页。

提供了充分的热能和水分，故农业最早得到发展。游牧文明区多处北寒带地区，少雨干旱，多为草原和大漠，是流动畜牧的广阔场所，为发展畜牧业提供了良好的条件。正由于这地理环境和生产方式的不同，地理环境经由物质生产方式这一中介，给生活于其间的各民族文化类型的铸造奠定了物质基石，使其文化若明若暗地熏染了地理环境提供的色调，影响到了其生活方式与思维方式。如大河农业文明的稳定持重，与江河灌溉造成两岸居民农耕生活的稳定有关；草原游牧文明的粗犷强悍、向外扩张，与来自草原多变的恶劣气候提供的“射生饮血”的游牧生活方式有关。

地理环境为文化发展提供了多种可能性，并从多方面影响了生活其间的各民族文化，但这种影响是通过人的自身活动实现的，人文因素是转变为现实的选择动力。人与自然之间呈双向交流关系。一方面，人类的活动始终受到周围自然环境的影响和制约，另一方面，人类在自身的发展中又不断征服自然，改造自然。这样，人类在社会实践中就形成了自己的经济形态。中华民族历史上实际就包括了农耕与游牧两种经济形态。如前所述，从事农耕经济的中原汉族聚居区，人们如不出现大灾荒、大战乱就甚少迁徙，即“固土重迁”，并多年形成了保守性和受容性极强的文化心态。而与追求稳定的农耕人形成强烈对照的是从事游牧经济的北方草原游牧民族。他们无城郭、耕地，迁徙无定，游牧为主；全民善骑战，极其勇猛强悍；畜牧、狩猎和从事扩张战争，是其生活方式的两个互为补充的方面。

这样，历史上中华民族从事农耕与游牧两种经济形态的人们就一直存在着长期对垒和互补、融合的局面。对垒是相对的，互补、融合、交流是绝对的。从对垒的角度讲，骑马游牧民族虽然经济文化一般处在较落后的地位，文明发展程度大大低于中原农耕民族，但他们善于骑射和勇猛强悍，使其武功十分强盛，经济文化相对先进的农耕人往往难以抵敌。中国的万里长城就是中原

农耕民族采取守势的很好证明。

但互补、融合与交流才是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的永恒主题。实际上双方的对垒战争亦是文化互补、民族融合的一种激烈形态。一方面，游牧人虽然整个社会发展水平处于较落后地位，但他们也有其明显优势。其一，孔武善战，骑射为其绝技；其二，流动生活，成为异域远方文化的传播载体。在整个古代，中原农耕人学习游牧人的骑射技术，吸收游牧人从远方带来的异域文化，并以粗犷豪放的游牧文化作为农耕文化的复壮剂与补强剂。在战国时期的赵武灵王“变俗胡服，习骑射”^①，使赵国迅速强大起来就是典型事例。唐代承魏晋南北朝以降汉胡文化融合之势，增添了新的生命活力，是构成唐代繁荣昌盛的动力之一。北方游牧民族还由于它的流动性强，能够学习别的民族的先进文化，还将西域的科学技术传入中原农耕区。如契丹战胜回纥得到西瓜，又把种植西瓜的技术传给中原汉人^②；宋代仿效回回炮，并加以改进推广^③，都是农耕区受到游牧区积极影响的生动事例。并由此说明文化相对处于先进地位的中原农耕区汉族人民，对北方游牧人及游牧文化是抱一种宽容接纳和积极学习态度的。虽然也不乏自视先进、鄙薄异族的事例，但总的来说还是能接纳和学习的。其突出者如唐太宗就曾说：“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④又说：“夷狄亦人耳，其情与中夏不殊。人主患德泽不加，不必猜忌异类。盖德洽，则四夷可使如一家。”^⑤表明了盛唐文化的恢宏气度。至于元代与清代，更由于系北方游牧民族所建立，学习接纳游牧文化就更不在话下了。元、清两代统一长城内外，以疆域空前展拓，异域八方文化大聚会大繁荣而彪炳史册。

① 《史记·匈奴传》。

② 洪皓：《松漠纪闻》下。

③ 《宋史·兵志》。

④ 《资治通鉴》卷一九八、一九七。

⑤ 《资治通鉴》卷一九八、一九七。

从游牧文明角度来看，游牧人则更大量地从农耕人那里学习先进的生产方式、政治制度以至改变自己的生活习俗，促使自身的社会形态发生历史性飞跃。其间尤引人注目的是，以征服者身份进入农耕区的游牧人在高势能的农耕文化氛围中，往往“为被征服者所同化”^①。鲜卑人建立的北魏政权号召学习汉文化。魏孝文帝拓跋宏“雅好读书，手不释卷，五经之义，揽之便讲”^②。他大刀阔斧地实行以三长制、均田制为基本内容的汉化改革，使北魏社会迅速发展。元代蒙古人入主中原，亦热衷学习汉文化，促进了社会进步。清季从努尔哈赤开始，到康熙、乾隆，更是汉文化高手，使中国封建社会出现了又一鼎盛期。从这些游牧、半游牧民族的领袖人物身上，看到了他们学习接纳汉文化的渴求与积极性。当然一般百姓身上也同样有这种渴求，这样的记载史不绝书。

由此可以看出，中国农业和游牧两大文明区绝非是自我禁锢的系统。他们往往通过迁徙、聚合、战争、和亲、互市等形式，进行交流融合，不断互补互摄，历数千年，方融会成今日气象恢宏的中华文化。因此，“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中华文化是农耕人与游牧人在长期既相冲突又相融会的过程中整合而成的”。^③

以上从理论方面简要论述了农业文明与游牧文明各自的特质及其互相融合交流以至冲突的概况，那么同属于游牧文明的蒙古文化与代表了农业文明的汉族文化又是一种什么关系呢？当然他们之间的关系同农业文明与游牧文明这一大前提是相一致的，二者既有融合交流的一面，亦有冲突的一面。所以，这就需要从历史背景方面进行探讨。因为蒙古民族于12世纪在蒙古大草原崛起之时，广袤的蒙古大草原并非蛮荒一片，而是已经有诸多历史民

① 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199页。

② 《北史·高祖孝文帝本纪》。

③ 冯天瑜等：《中华文化史》第125页。

族在这一大舞台上创造了灿烂的游牧文化，蒙古民族在很大程度上继承了他们的文化传统。可见于史书记载的如匈奴、鲜卑、突厥、契丹、女真等民族。如果再往前推，在新旧石器时代以及春秋战国时，活跃于北方蒙古大草原上的古老人种及民族，他们与中原地区亦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近年在内蒙古呼和浩特东郊大窑村南山和前乃莫板脑包梁发掘出的大批石核、砍伐器、尖状器、手斧、刮削器、石锤、石球等石器，属旧石器晚期产物，学术界称其为“大窑文化”。这些石器同中原出土的旧石器时代文物相比较，无论器形上，还是制作技术上，既有共性，也有其特殊性。它与山西襄汾的丁村^①和怀仁的鹅毛口^②遗址的出土物极为相似，关系密切，同属一个文化发展系统。它比丁村文化略晚，又比鹅毛口遗址早，可以说是上承丁村文化，下接鹅毛口，“成了从丁村文化向鹅毛口文化发展中的阶梯之一”^③。填补了两者时间上的空白。另外还有河套人遗址，辽宁省喀左县鸽子洞遗址等，也呈现同样情况。说明我国北部边疆地区与内地，从旧石器时代起，在文化发展上就有各种联系。

到了距今大约一万五千年左右的新石器时代，在内蒙古呼伦贝尔盟扎赉诺尔发现的人类化石及其文化遗物，与柳江人和山顶洞人一样，都是形成中的蒙古人种。特别是在内蒙古赤峰地区老哈河、西拉木伦河以南，以及大小凌河流域发现的红山文化，具有重要影响。它由于毗邻华北平原，表现在文化上，彼此之间的影响也较深。它的文化面貌，除具有地域特征外，还有浓厚的仰韶文化的某些因素。其彩陶无论在陶质上、制法上、器形上以及彩绘图案的风格和布局上，都与仰韶文化的彩陶有密切关系。其

^① 裴文中、贾兰坡：《山西襄汾丁村旧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1958年。

^② 贾兰坡、尤王柱：《山西怀仁鹅毛口石器制造场遗址》，《考古学报》1973年第2期。

^③ 贾兰坡：《中国大陆上的远古居民》，天津人民出版社，1978年。

中的泥质红顶碗、钵，又与西安半坡所出几近一致。内蒙古鄂尔多斯高原发现的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存，也与中原地区极为相象。可见其文化交流的源远流长。

进入夏商周时期，根据考古资料证明，我国北方草原游牧地区受夏商周文化的影响更深。最突出者如在内蒙古赤峰市一带发现的被称作夏家店下层文化与夏家店上层文化。夏家店下层文化遗址已有铜器出土，并有不少陶器，是与夏商文化并存的青铜时代文化。其陶器与它时代相当的河南偃师二里头^①陶器群相比较，无论器物的组合还是制陶的方法都有许多相近之处。它们都有许多同样类型的鬲、甗、鼎、盆、罐等，在墓葬中都发现了专用的陶器和鬻等。文化遗迹方面也有许多与夏商文化相同之处，如夯土墙等。

夏家店上层文化内涵更加复杂。它既有富于自己特色的遗物，又有与中原和相邻地区形制相近、花纹一样的出土品。其出土的铜器既有礼器、容器，也有工具、武器、车马器和各种铜牌饰等。其中双耳鬲、双联罐、豆形器，剑柄饰有花纹的各式短剑、剑鞘、盾、铜牌饰等独具特色。马蹄足盆形鼎、铜镜、二穿戈、柳叶形矛等又显示出与周文化的一致性。

夏商周这一时期，在中国的史书与传说中已有獫狁、荤粥等一些北方古老民族的记载和传说，并把他们笼统地称之为胡，或含有鄙视地称作狄。这些古老民族大概与其后的北方游牧民族有某种渊源关系。说明此时他们与中原农耕民族的交往已增多，已见于史书记载。

到了秦汉时期北方游牧民族与中原农耕民族的交往联系就有大量的资料可以较详细的论述了，其中较突出者是匈奴。当中原秦并六国的时候，漠北的游牧民族也开始统一在一个王权之下，这

^① 中科院考古所洛阳发掘队：《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65年第5期。

就是匈奴帝国。秦强盛时曾派大将蒙恬北击匈奴，并乘胜把燕赵等国以往所修的边墙连接增筑，建成了今天有名的万里长城。秦灭亡的楚、汉相争时期，匈奴在头曼及其子冒顿两单于统御之下，迅速强大起来，东击东胡，西攘月氏，收复秦将蒙恬所夺之地。到了汉代，匈奴更南进攻略山西中部。汉高祖刘邦御驾亲征，反陷于白登（今大同长城线附近）之围，侥幸脱险。《史记·匈奴传》说：“高帝乃使刘敬奉宗室女为公主，为单于阏氏，岁奉匈奴絮缯、酒米、食物各有数，约为兄弟。”从此，汉对匈奴采取和亲政策，经济联系也比较密切。汉武帝时北伐匈奴，军事上虽处优势，但亦有李广利和李陵“降虏”之败。

公元前60年左右，匈奴发生内讧，呼韩邪和郅支两派，因争夺王位而分裂。匈奴从此走向下坡路。

匈奴的瓦解，使北方草原暂时处于混乱状态。中原地区也因东汉的衰落，三国以后的一连串动乱，使两者之间的联系交往一度受到阻隔。但那些北方游牧民族，特别是处于长城一线者，大量涌入中原与汉民族融合在一起。

继匈奴而起的是起源于兴安岭一带的鲜卑族。鲜卑属东胡系统，强盛于公元2世纪。其首领檀石槐统一诸部，“南抄缘边，北拒丁零，东劫大余，西击乌孙，尽据匈奴故地”，建立起了强大的军事联盟。他仿照匈奴旧制，将领地分为东、中、西三部分，各置大人统领，总属于自己。其慕容氏进入河北平原建立了燕国，拓跋部更统一了黄河流域，建立了北魏王朝，宇文部建立了北周王朝。源于匈奴的政治军事组织系统及形式，在中国古代北方游牧民族的历史发展中产生了重大影响。

鲜卑族由于入居中原，与汉民族的联系日益加强，故对农业生产非常重视，并大量延揽汉族士人为官，使其生产、生活方式有了很大转变，加速了其封建化进程，促进了各民族之间的融合交流。

与鲜卑族同时或前后不等北方草原还活跃有乌桓、柔然、敕勒等游牧民族，这大约是中国历史上的魏晋南北朝时期。这时期虽然南北对峙，但经济文化的交往还是广泛展开。如大量互派使节，开展互市贸易。北方的牲畜、皮毛等畜产品运往南方，南方的农产品、纺织品及糖酒运往北方，满足了各自的不同需要。文化方面南方太湖流域一带的《吴歌》及江汉一带的《西曲》在北魏时传到北方。至隋文帝平陈，流入江南的“华夏正声”及江左乐工，又由南而北至于长安。^① 南朝两大文士王褒和庾信到达北方，又给北方文学与书法以很大的影响，他们本人也写了不少反映北方边疆生活与从军的诗，使其诗风有很大的转变。北周明帝宇文毓、赵王宇文招的诗文多取法庾信。特别是北朝民歌《敕勒歌》：“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成为中国文学史上的千古绝唱，代表了北方文学的鲜明特色。这南北文风的融合对隋唐诗歌亦产生了重要影响。

进入隋唐时期，北方草原又兴起了一个强大游牧民族突厥。突厥兴盛时管辖“东自辽海以西，西至西海（今里海）万里，南自沙漠以北，北至北海（今贝加尔湖）五六千里”的广大地区。^② 其经济形态一如匈奴、鲜卑，亦是游牧经济，社会组织是生产与军事相结合，普通百姓平时从事游牧生产，战时则是乘马挂刀的骑兵。正如后突厥大臣瞰欲谷所说：“……突厥人户寡少，不敌唐家百分之一，所常能抗拒者，正以随逐水草，居处无常，射猎为业，人皆习武，强则进兵抄掠，弱者窜伏山林……”^③ 此时突厥与中原王朝虽时有战斗发生，但友好交往是主基调。双方开展互市贸易，交换农畜产品，出现了“蕃汉非常快活，甲兵休息，互市交通”的

① 《隋书·音乐志下》。

② 《周书·突厥传》。

③ 《旧唐书·突厥传上》卷一九四。